

延安文学论稿

张可礼

山东教育出版社

34

建安文学论稿

张可礼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夏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875印张 4插页 274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

书号 10275·49 定价 2.15 元

# 目 录

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	1
建安诗歌的新特点·····	22
建安诗歌的三种产生方式及其特点·····	35
建安时期的辞赋·····	50
建安时期的散文·····	66
建安时期的小说·····	83
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及其形成的原因·····	116
建安作家的艺术个性特点·····	128
建安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	152
曹植文学思想述评·····	179
建安时期思想解放与文学的发展·····	191
建安作家的修养·····	206
建安文学和它以前的文学传统·····	229
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	242
建安文学的影响·····	252
如何理解“建安风骨”? ·····	276
<b>附录: 一、刘勰对三曹评价的得失·····</b>	<b>295</b>
二、建安文学研究论著索引·····	312
<b>后记·····</b>	<b>374</b>

## 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

### 一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时间是从公元一九六年到二二〇年。但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包括的时间比建安年间要长，向前应当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黄巾大起义算起，向后应当迄止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二三七年），前后包括五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文学是怎样发展的？有没有阶段性？过去学术界很少有人论及。这个问题不解决，编写或讲授建安文学史，常常是作家作品排队，难以看到它的发展变化过程，更难揭示它的发展规律。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划分建安文学发展的阶段，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划分的依据。依据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依据是什么？一般有两种考虑：一是主要以历史发展的阶段为依据。而历史发展的阶段常常是由经济政治发展的特点来决定的。因此，以历史发展的阶段为依据，实际上主要是着眼于经济政治发展的特点。二是主要以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和文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为依据。两相比较，应当说后者更科学一些。因为文学的发展和经济政治的发展虽然关系密切，但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完全吻合的。文学的发展毕竟有它的特殊性。文学发展的一般进程正是通过这种特殊性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殊性是我们认识

文学发展的基础。另外，文学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有特殊性。正是这些特殊性，使文学发展表现出阶段性。因此，要划分建安文学发展的阶段，应当把建安文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即不同特点作为主要依据。这样考虑，并不是说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与历史的发展阶段没有关系。实际上，建安文学的发展同其他时期的文学发展一样，和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关系极为密切。拿经济来说，在整个建安时期，经济基础的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但在不同阶段却有不同特点，这些特点自然会影晌文学的发展。其影响有时是直接的，但更多的是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其中重要的是政治和社会思潮。这是从理论上考虑。如果再考察一下建安文学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到，建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在作家的状况，作品思想内容的主要倾向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我们根据这些特点，完全可以看出建安文学发展的阶段性。

根据上面谈的依据，整个建安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分说三个阶段。

## 二

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到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一八四年至二〇四年），前后约二十年。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学的形成时期。

这一阶段是由两汉到魏晋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基本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长期依附于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被赶出了政治舞台。一些士大夫官僚和地方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陆续出任州牧

郡守。他们积蓄力量，拥兵自强，竞盗声名，逐鹿混战。政治的急剧变化，社会的强烈动荡，战祸的连绵不断，使经济惨遭破坏，人们死亡枕藉。有名无实的东汉皇权，不仅无力收拾这种动乱的局面，而且成了人们批判的对象。依附于两汉政权的陈腐的道德规范、烦琐经学等也随之失去了控制人们的力量。地主阶级中下层的文人学士被抛到了动乱之中，上层知识分子也是荣华富贵顿时丧落。战乱使他们程度不同地经受了苦难，对现实生活有比较深切的体验，这就使他们能够挥笔疾书，写出了一些感人肺腑的作品。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等，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作。

以悲痛感伤为基调是这一阶段文学在内容方面的主要特点。“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曹操《薤露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王粲《七哀诗》其一）。这些典型的诗句，直抒胸臆，“哀伤”、“断人肠”、“伤心肝”之类的词语，不假旁托，说明诗人内心有抑制不住的痛苦和感伤。这种痛苦和感伤构成了这一阶段作品的典型音调。作者在谱写这种典型的音调时，并没有完全停止在悲怀感慨上，而是同揭露东汉末年政治的腐败和描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结合在一起。这在上面列举的几篇作品中都有比较深刻的反映。

曹操的《薤露行》描写了东汉末年由于皇帝的昏庸，“所任诚不良”，结果导致了董卓乱政，执君杀主，“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的悲惨结局。诗中叙写汉末时事，抒发丧亡之哀，直指皇帝和军阀。这就使这首被历来誉为“诗史”的优秀作品，具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意义。《蒿里行》是曹操的另一篇名作。这首诗先从袁绍等兴兵讨伐董卓写起，接着笔锋一转，叙写袁绍等踌躇不前，互相混战，竞相称

帝。最后描绘了军阀混战造成的惨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全诗不仅饱含着强烈的愤慨和悲伤，同时还揭示出人民惨遭死亡的原因在于军阀争夺“势利”。这就使这首诗同《薤露行》一样，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特点，而现实主义正是建安文学总的创作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作家虽然面对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不胜悲痛，但是他们并不消沉，并没有产生对人生、对前途的厌倦和空幻之感。这在王粲的《七哀诗》（其一）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首诗写的是，作者离长安去荆州避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白骨蔽野，母亲弃子，军阀混战造成的惨景，深深地感动了诗人，致使诗人“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但是，面对这样的惨景，诗人并没有丧失人生的目标。诗最后写道：“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诗人在最后特别提到“霸陵”和“下泉”，表现了他由乱思治的思想感情。这一现象说明，这一阶段以悲痛感伤为基调的作品含有理想的因素。作家经历了动乱，描绘了动乱，同时也希望以治世代替动乱。这种理想的因素虽然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微弱，但它在下一阶段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整个建安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重要特点之一。

从文学体裁来看，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五言诗。五言诗源于民间谣谚，在汉乐府民歌中已经臻于成熟。但两汉文人之作，除了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之外，却极为罕见。到了这一阶段，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文人注重学习汉乐府民歌，写了不少五言诗，而且成功的作品也很多。所以《文

心雕龙·明诗篇》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这一阶段，大量的优秀的文人五言诗的出现，是建安文学在诗歌形式方面的重大贡献，它为以后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语言风格方面，这一阶段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古朴质直。作家在描绘社会现实时，似乎是无暇做过细的思考，常常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接叙写所闻所见。一般诗句和通篇立意构思，比兴手法用得较少。诗人在表现愀怆悲伤的情感时，如上所述，常常是直抒胸臆，有时甚至直接使用“断人肠”、“伤心肝”之类的词语。这说明，这一阶段的作家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很大，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多地保留了汉乐府民歌质朴无华的特色。

### 三

第二阶段从建安十年到二十二年（公元二〇五年至二一七年），前后约十二年。这十二年是建安文学全面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的前几年，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壮大起来的曹操集团，经过著名的官渡之战，打败了当时威震全国、势力雄厚的北方豪强袁绍集团，建安九年攻占了他的大本营邺城，建安十年消灭了他的残余势力袁谭等，逐渐统一了冀、青、幽、并四州。曹操攻占了邺城，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晋书·乐志》说：“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于此也。”从此，邺城成了曹操“霸府”的所在地，许多文人陆续集中到这里。这一阶段，虽然还有动乱，但远不象以前那样战乱频仍、死亡惨重。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一直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因而北方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相对地得以安定，个别



地方甚至出现了“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士女满庄墟”。（王粲《从军诗》其五）的景象。

曹操为了治理战乱的创伤，继续战胜其他军阀，从而夺取整个天下，在政治思想上，他十分重视刑名，强调人事。他基本上否定了两汉以经学和“仁孝”为中心的用人标准，主张“唯才是举”，广泛延揽能“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人材。曹操比较强大的物质力量和他的一些进步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文人，如王粲、陈琳、阮瑀、刘桢、徐干、应玚、邯郸淳、繁钦、路粹和丁仪兄弟等等，都逐渐看到了曹操的力量，看到了曹操采取的很多进步措施。因此，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先后投靠了曹操，聚集到邺城，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曹氏父子不象两汉一些帝王贵族那样，把文人视为俳优，而是在政治上相信他们，根据他们的才能和特长任用他们。以前朝政中有不少迂阔的经生宿儒，现在很多被有才华的文人所代替。这就使当时的文人，在政治上有了依靠，在利禄仕途上有了保证，有了施展自己才能，实现自己抱负的条件。在文学创作上，曹氏父子虽然都是杰出的作家，但他们不太霸道，基本上能和文人友好相处，对文学创作总的是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这一阶段文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北方的渐趋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很大的改善。他们当中，虽然有不少人曾多次随军出征，体验过戎马倥偬的艰辛和苦难，但也确有一些时间安居邺城，经常和曹丕兄弟在一起饮宴歌舞、游园射猎、唱和诗赋，过着比较安闲奢华的生活。上述这些，对这一阶段的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使它在前一阶段文学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得以全面的发展，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东西。

首先，作家视野开阔，题材多种多样。动乱对社会的破

坏，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人民生活的饥寒交迫，妇女的不幸遭遇，对曹操集团的种种歌颂，曹氏父子及其周围文官武将的生活情趣……这些题材，虽然有的我们在第一阶段的作品中已经看到，但更多的是在这一阶段才进入我们的眼帘。题材的广阔多样，使这一阶段的建安文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仍是这一阶段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前一阶段军阀混战对社会的严重破坏，还没来得及整治，惨痛的创伤仍然历历在目。这一阶段新的战争还在不断进行。新的战争虽然和以前的并不相同，但是也给人们造成了很多苦难。这就使当时不少作家忧伤满怀、感慨不已，写了一些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作品。曹植的《送应氏诗》（其一）以感伤的笔调，叙写了都城洛阳被董卓焚掠后的荒寂景象。蔡琰的《悲愤诗》描述了战乱造成的流离死亡之苦，母子的被迫分离之痛，字里行间饱含着血泪。曹操的《苦寒行》描写了他率领大军西征途中，士卒身受饥寒之苦，作者心怀思归之情。其悲痛感伤虽不象《蒿里行》那样强烈，但时世多艰、战事多难仍使作者发出了由衷的悲悯。上述几首诗歌写的题材，虽然上一阶段有些作品也曾吟咏过，但由于这一阶段作家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有自己独特的、深切的体验，因而写出来的作品仍是那样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如前所述，这一阶段由于北方渐趋统一，社会相对地安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刚刚经过了大灾难，生活仍然贫困不堪。这两方面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都有真实的反映。反映前者的典型作品是曹操《步出夏门行》中的《冬十月》；描写后者的代表作是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和曹丕的《上留田行》。《冬十月》反映了北方农村

严冬季节粮食收藏、商旅开始活跃的情景：“耨耨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泰山梁甫行》描写了“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的贫困生活。《上留田行》用鲜明对照的手法，揭露了当时贫富的天壤之别：“居世一何不同”，“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上面列举的三篇作品，虽然数量不多，水平也有高低之分，但是在整个建安文学中却极为罕见。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写这类题材的作品。

在这一阶段，随着封建礼教和烦琐经学的被冲击，人的作用受到了重视，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妇女的种种不幸更加引起了作家的关注，因而出现了不少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这一阶段，由于曹操集团和其他军阀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而且多发生在边境和江淮一带。这就使不少男子要告别妻室、远离故乡，担负繁重的徭役和其他征战任务。他们当中有的长年不归，有的死于战争和灾疫。这种情况即使统治者当中的中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以幸免。曹操建安十四年写的《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一文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看来家室怨旷、妇女哀伤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一阶段出现了不少描写怨女思妇和孤儿寡妇的诗赋。前者如曹丕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和《燕歌行》；后者如曹丕、曹植和王粲的《寡妇赋》。《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诗，用一位新婚女子的口吻，抒写了她与挽船的丈夫刚刚结婚，就被迫长期分离的哀怨和痛苦。《燕歌行》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用如泣如诉的笔调，反映了一位女子对长期在外的丈夫的深沉思念和难以排遣的忧伤。《寡妇赋》取材于阮瑀家庭的不幸遭遇。据《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记载，阮瑀于建安十七年去世。

阮瑀的去世使曹丕、曹植和王粲等人“怆然伤怀”。为了“叙其妻子悲苦之情”（《曹丕《寡妇赋序》》），他们分别写了《寡妇赋》。曹植的赋，现在仅存两句。曹丕和王粲的赋留下来的较为完整。两篇赋都写得哀怨动人。如王粲的赋写道：“提孤孩兮出户，与之步兮东厢。顾左右兮相怜，意凄怆兮摧伤……涕流连兮交颈，心懔结兮增悲。欲引刃以自裁，顾弱子而复停。”值得注意的是，阮瑀是当时的著名文人，生前为曹操仓曹掾属，甚得曹氏父子赏识。这样的人死后，其妻子尚且如此孤苦无依，至于一般平民百姓当中的寡妇孤儿的悲惨命运，那就更可想而知了。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不合理制度，曾经给无辜的妇女造成了很多悲剧。这一阶段有不少作家对此极为关切，写了一些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平虏将军刘勋先娶王宋为妻，后因她无子而被休弃。王宋的不幸遭遇，当时引起了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怜悯与同情。他们以此为题材，分别写了《出妇赋》，曹植另外还写了诗歌《弃妇篇》。这些诗赋虽然写的是王宋一个人的遭遇，但“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弃妇篇》），却是当时不少妇女的共同不幸。因此可以说，这类作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男尊女卑、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的社会现实。

作为新的题材在这一阶段文坛上出现的还有对曹氏父子的歌颂。过去对这类题材，常常是笼统地扣上“作伪和庸俗”的帽子而予以全部否定。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恐怕不够恰当。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作具体的分析，既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一概否定。如果仔细分析这类作品，可以看到，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有一些作品基本上歌颂的是曹氏父子进步的方面，陈琳的《神武赋》，王粲的《从军诗》（其一、其四）和《浮淮赋》，

阮瑀的《纪征赋》，应玚的《征赋》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作品就其主导倾向来说，是应当肯定的。这里仅举《神武赋》和《从军诗》（其一）作为示例。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消灭袁绍逃亡到乌桓的残余势力、安定东北边境，亲自率军征伐乌桓。陈琳随军出征，写了《神武赋》。赋中歌颂了曹操“六军被介，云辎万乘”的威武雄壮和“单鼓未伐，虏已溃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的辉煌胜利。建安二十年，曹操为了巩固其在关中的地位，进而统一汉中，亲自领兵西征，降服了控制汉中一带的张鲁。王粲参加了这次征战，回来写了《从军诗》（其一），歌颂了曹操在这次战争中的功绩：“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类似这样的作品，虽然有些溢美之词，但是因为曹操进行的这些战争，在当时有利于祖国的统一，是进步的。曹操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这些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否定了曹操的功绩，把他从这些进步的战争中抹去，那就无法讲清这段历史。因此，上述这些作品歌颂曹操的功绩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其二，有一些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属于庸俗的“颂祝”之作。王粲的《公宴诗》、《太庙颂》、《俞儿舞歌》四首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些作品基本上属于“帮闲”文学。如《公宴诗》主要是写作者陪曹操夏天饮宴的情况，最后四句歌颂曹操道：“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这类作品脱离了社会现实，空泛枯燥，不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应酬唱和之作，其主要内容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篇》）。这类作品，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在艺术技巧上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但就其主要方面来看，它们脱离了时

代的脉搏，有些内容空泛，有些索然无味，反映了曹氏父子和其他文人在邳城生活时的情况。上面谈到的庸俗的颂祝之作和应酬唱和之作的出现，实际上是建安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股逆流。它在文学史上的主要影响是消极的。

文学的繁荣与否，与题材的关系十分密切。题材的丰富多采，常常是文学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这一阶段的建安文学，题材如此广阔多样，可以说是建安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创作中的理想成分有明显的增强，不少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激情。

如果说前一阶段，曹操作为许多军阀之一，对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消除战乱、进而统一天下，还缺乏信心的话，那么到了这一阶段，由于力量的强大，并且又占据了中原，他则完全充满了信心。曹操是这样，曹操周围的不少文人在思想上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历史和思想的变化，使这一阶段不少作品理想的成分增强了，浪漫主义的激情比较强烈。曹操《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曹植的《白马篇》，王粲的《从军诗》，陈琳的《游览》诗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观沧海》表面上是写大海波涛汹涌、茫茫无际，实际上正如清朝人张玉谷所说：“此志在容纳，而以海自比也。……写沧海，正自写也。”（《古诗赏析》卷八）借写沧海抒发自己胸怀的博大和称霸天下的雄心。《龟虽寿》表现了作者面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自然规律，不仅没有丝毫的消沉之感，反而激起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壮情怀。

《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捐躯报国，带有理性化色彩的游侠形象，表现了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的远大抱负。《从军诗》和《游览》诗当中有不少诗句抒发了王粲和陈琳希望建功立业、名垂史册的满腔激情。“窃

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从军诗》其一）“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用”（其二）。“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其三）。“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其四）。“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其一）人生易逝，不愿虚度时日，一心想及时有所作为的慷慨之情，在这些诗句里表现得极为强烈。当时，严重的战争创伤需要整治，祖国的大地有待统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曹氏父子与王粲、陈琳等人，怀有理想，积极入世，希望勋铭钟鼎，应当说是顺乎历史前进潮流的。

再次，注重文采。前面曾经说过，建安文学的第一阶段紧承汉代，在语言方面是质有余而文不足，比较明显地保留了汉诗淳朴少文的特点。到了这一阶段，上述情况有所变化。文人注意艺术形式，崇尚文采，渐成风气。在这方面，曹丕、曹植的影响较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主张“诗赋欲丽”。这一主张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他的诗歌常见工语：“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浮沉。”（《善哉行》其二）“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于谯作》）“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芙蓉池作》）这些诗句表明曹丕是相当注意追求辞采的。和曹丕相比，曹植在这方面更为突出。钟嵘《诗品》卷上称颂曹植的作品“辞采华茂”；清朝人刘嗣绾说曹植“声名三国最，文藻一家工”（《曹集考异》卷十二引）。钟、刘两人的看法完全符合实际。曹植确实注重辞采，这在他这一阶段的作品中有许多明显的表现。曹植工于起调，前人已有很多论述。以前的诗歌，对句极为罕见，而曹植的作品却常有出现，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诗》）“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以前的诗歌，用字较少刻意锻炼，而曹植用字却极为精细，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公宴诗》）“冒”字的使用，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曹植对诗文的音韵也比较重视。他在《平原懿公主诔》中赞颂懿公主“生在十旬，察人识物。仪同圣表，声协音律。”为一个孩子作诔，竟提及她的音律，足见他平时是相当注意音律的。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表现，如“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这些诗句，平仄谐调妥贴，俨然后来的律句。在曹丕和曹植的影响下，当时其他文人也比较重视文采，如王粲《杂诗》其二云：“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刘桢《赠徐干》云：“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翩翩”。这些诗句用字精审、注重锻炼表现得比较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文学，虽然重视文采，但并不轻视内容；虽然重视语言锻炼，但仍保有汉乐府民歌率直明快、自然清新的特点。正如黄侃《诗品讲疏》论建安诗所说：“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上述特点使这一阶段的文学，既不象汉代一些文人诗那样“质木无文”，也不象两晋南北朝的许多作家那样轻视内容、过分地追求形式，而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总的面貌是文质并重。

#### 四

建安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建安二十三年到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二一八年至二四〇年），前后约二十二年。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学的衰落阶段。

我们之所以说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学的衰落阶段，主要是因



为在这一阶段的文坛上，反映人民的生活、讴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急剧地、大量地减少，而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贵族文学却得到迅速的发展。庸俗地为曹魏统治者唱赞歌的作品以及为了满足他们奢华生活而出现的应酬作品，几乎充斥了整个文坛。如曹丕代汉称帝前后，不少文人为了迎合曹丕的口味，写了许多颂祝之类的作品。曹植的《大魏篇》，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首，邯郸淳的《受命述》，刘劭的《嘉瑞赋》、《龙瑞赋》以及连篇累牍的章表等，都属于这一类。这里仅对《大魏篇》和《魏鼓吹曲》稍加分析。我们知道，曹植和曹丕为了争夺太子，本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曹植对曹丕称帝是有异议的。但是曹植在《大魏篇》中却称颂曹丕代汉称帝是“应灵符”，赞扬他称帝之后，“圣德致泰和，神明为驱使”，“众吉咸集会，凶邪奸恶并灭亡”。这些诗句显然表现了曹植为人庸俗的一面。关于《魏鼓吹曲》，据《晋书·乐志》记载：“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列于鼓吹，多叙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这十二首诗写的内容，虽然有些是历史事实，但由于它们是应制之作，目的是为了叙述曹魏“以功德代汉”。因此，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应当属于为曹魏统治者代汉称帝服务的庙堂文学。又如曹丕称帝以后，生活更加腐化。他儿子曹叡继位期间，又大兴土木，兴建都城宫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物。当时一些文人为了满足曹丕父子和其他贵族腐化生活的需要，写了不少有关都城宫苑的作品，如邯郸淳、卞兰各自写的《许昌宫赋》，刘劭写的《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何楨写的《许都赋》等。这些辞赋多是模仿汉大赋，描绘都城宫苑建筑华美，歌妙舞丽，极尽铺采摘文之能事。上述这些作品的出现，说明这一阶段文学贵族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也说明前一阶段文学发展中的那股逆流，